

「土垠」爲漢「居廬訾倉」故址說



「居廬訾倉」倉址（作者提供）

王炳華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古今論衡 第 22 期 2011.06

居廬訾倉，初見於《漢書·西域傳》，《魏略·西域傳》中亦見記錄。漢晉時期，是出河西走廊入西域樓蘭途中一處重要站點，地位衝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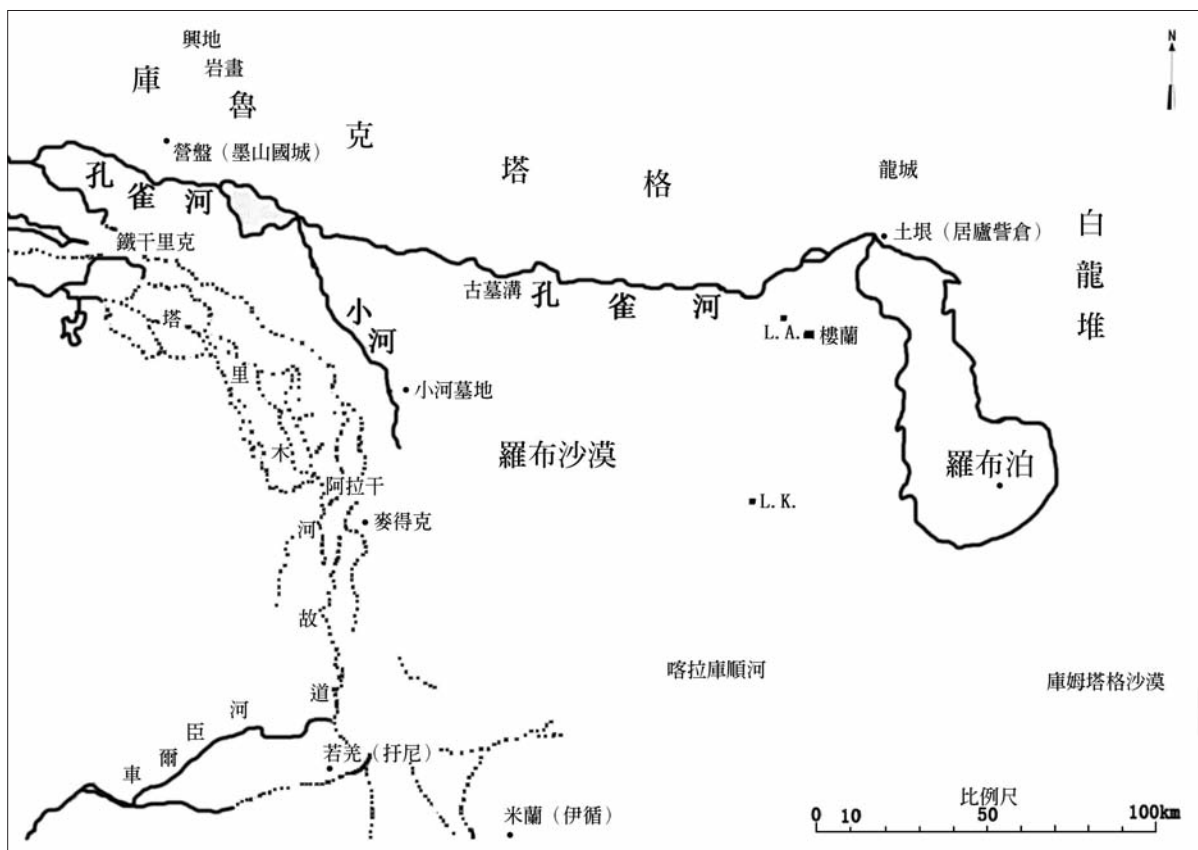
「居廬訾倉」故址所在，一個世紀以來，學界多有關注，但並未得到準確的結論。筆者的觀點是：「居廬訾倉」故址，就是黃文弼先生在二十世紀三〇年代發現的土垠。

「土垠」遺址，坐落在羅布淖爾湖北岸。是新疆地區迄今唯一出土過西漢紀年木簡的古代遺存。它既是漢王朝開拓西域的前進基地，又是交通西域的後勤補給、郵置站點。相關遺存，蘊含豐富的歷史內涵。對深入認識漢、晉時期的樓蘭，瞭解西漢王朝開拓、經營西域的事業，西漢戍邊健兒們筚路藍縷、拓邊衛邊的豐功偉業，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值得認真關注。

「土垠」，在二十世紀前期，中外學者重點展開過的羅布淖爾考古中，當之無愧，應是重大的考古收穫之一。其意義，並不弱於發現樓蘭。它的發現，是黃文弼先生不朽的奉獻。在黃先生畢生從事的西域考古事業中，算得是最重要的建樹之一。可惜的是黃先生初涉土垠，認識一開始就進入誤區：這就是判定遺址爲烽燧。先入爲主的結論，嚴重侷限了他對遺存的深入研究。

這一遺址，自七十年前黃文弼先生調查後，直到二十世紀晚期，再未有考古工作者涉足其地。在筆者四十多年的新疆考古生涯中，也只是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以後，才得機會到了土垠。第一次進入，手持黃文弼先生當年考古報告，目驗當年他曾經報導的諸多遺跡，不少竟已尋覓無處。但也見到一些重要遺跡，是黃先生當年未曾關注，自然也未得介紹。如遺址西側傍湖存在一區土碼頭，直接顯示著羅布淖爾古代水運事業的存在，這是西域研究中從無人論及的新問題，可以給人以新的啓迪。（圖一）

爲深入認識土垠在樓蘭地區的交通樞紐地位，自第一次考察發現一些問題後，其後又多次進入土垠踏查。具體路線，有自庫爾勒循庫魯克塔格山南緣東行；也有自阿爾金山北麓米蘭北向；還曾自土垠東向，經三隴沙入玉門關，抵敦煌。這涉及當年土垠向東、西、南、北方向交通的地理形勢。在經歷過這一系列的考察調查後，逐漸明白土垠遺址在古代自敦煌進入西域道途中，確實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也逐步深入領悟到它在漢代西域歷史中，曾經發揮過重大的作用。其中，不少尚未爲人們關注。故不憚粗陋，深爲剖析。不足之處，尙祈不吝教示。



圖一：土垠遺址交通地理形勢圖（作者提供）

一、「土垠」遺址的發現及遺存簡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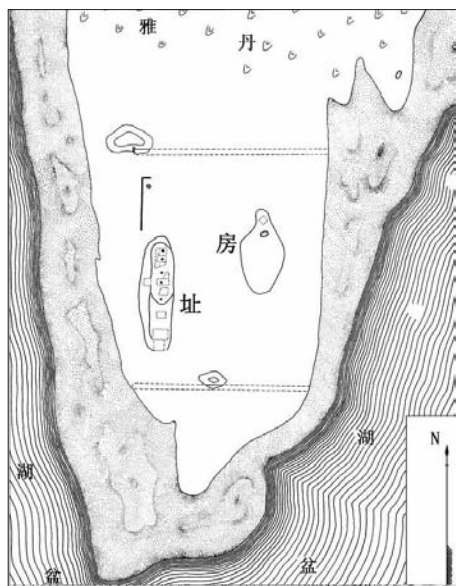
發現「土垠」遺址，功在對西域考古有開拓之勞的黃文弼。

黃文弼對土垠遺址有過兩次工作。第一次在一九三〇年四月，主要調查了土垠遺址本身；四年後，一九三四年五月，他再到土垠，除重訪遺址外，還調查了土垠北面的漢代古道，遺址西部與屯種有關的古渠、柳堤、居住遺址等。他兩次進入土垠，具體路線都是由吐魯番盆地鄯善縣魯克沁南下，經迪坎兒入庫魯克塔格山，越山至阿爾特密希布拉克（六十箇泉），復沿庫魯克塔格山南麓、孔雀河谷東行，入龍城雅丹，進抵土垠。這是一條我們未走、可以互相補充的路線。相關情況，見於其《羅布淖爾考古記》及《黃文弼蒙新考察日記》。^①

① 黃文弼，《羅布淖爾攷古記》（收入《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叢刊》之一〔北京：國立北京大學，1948〕），頁105-112，179-220。黃文弼遺著，黃烈整理，《黃文弼蒙新考察日記（1927-1930）》（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545-550。

土垠遺址，位於羅布淖爾湖北岸一處深入湖盆的半島之上，居孔雀河尾閘地帶：三面環水，只北面與鱗次櫛比的龍城雅丹相連續，而且被深深掩覆在叢叢土丘林中，真可以說是形勢獨具，十分隱密、不同一般。當年西漢的拓邊將士，選擇這一土島作爲進入樓蘭、聯絡西域南北道的前進基地，應當是經過認真調查、分析，而絕非偶然的決定。（圖二）

土垠遺址經緯位置，在 $E90^{\circ}12'30''$ 、 $N40^{\circ}46'30''$ 處。^② 黃文弼首次對這一遺址調查，先後費時六天。當年觀察的現象、初步的測量、附近的遺存，都是不可取代、值得珍視的重要資料，自二十世紀三〇年代至今，黃先生目驗、報告了的部分遺址，已消失無存，根據黃氏當年測圖、報告文字，本文略作歸納，引述介紹如下：



圖二：土垠遺址

（引自黃文弼，《羅布淖爾攷古記》）

（一）主要遺存

遺址居於「土垠平灘上」，「傍於海岸之三角洲，三面環水，惟北路通陸。」據其測圖，遺址大略爲長方形，南北長約一一〇公尺，東西寬約八十公尺。遺址西部，有「長方形土台，高八英尺許，長十九英尺。寬五英尺五寸」，其上有地穴式建築五處。另在遺址南北兩端見殘房址二處，以不規則土塊、鹹塊爲牆，頂已塌毀。遺址東部，有房址殘跡一處。北圍牆外「距約數十步」，有古房址一處。^③

（二）漢代古道遺跡

古道，這是黃先生於一九三四年五月第二次考察羅布淖爾土垠遺存時的主要發現，遺跡見於遺址北約五華里處，在鹽層下「顯白色泥痕，宛若轆〔轆〕轆，刮磨光平」，東北、西南走向。道路兩旁「時有五銖錢，及零銅件，與瑪瑙之屬」。在持續多日的踏查中，與這一古道路跡、走向，黃氏曾多次「遭遇」，古道「蜿蜒屈行」，「五銖錢散布地表，俯拾即是」。^④

② 此據筆者用地球衛星定位儀，在遺址所作之實測記錄。黃先生當年以陳宗器先生測定結果爲據，記其爲經度 90° 、北緯 $45^{\circ}10'$ ，有誤；參《羅布淖爾攷古記》，頁 105。

③ 同上書，頁 105-107。應及《羅布淖爾攷古記》目前求覽不易，雖原文較長，仍引錄於文末「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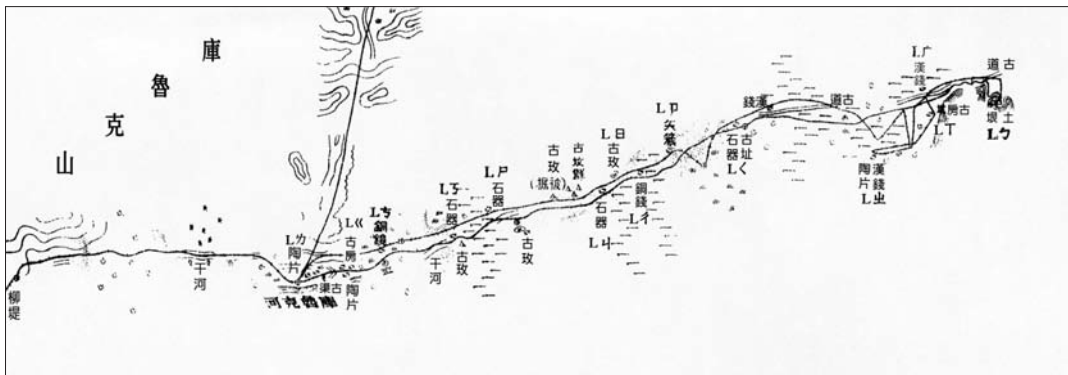
④ 同上書，頁 110。其云：「由此往北約五里許，有大道遺迹，類似古道。兩旁常有銅錢散布。於五月十四日

(三) 柳堤、古渠、居址

在土垠遺址西北、孔雀河下游，黃文弼第二次羅布淖爾考察中，曾發現柳堤一道：「西南東北行，長九百五十雙步。下爲土垠，上覆柳條，旁栽柳條一線。寬〔長〕一九〇米突。……其附近即有一四方形土台，……此堤之東南約十里二十里地，時覓得零銅件及玉器之屬，則當時居民必鬻聚於此堤之東南，及大河兩旁墾殖地無疑也」。古渠「寬丈餘，高者約二尺，直通於河……渠畔布陳黑沙陶片……沙堆上，有古房二所，……在此一帶，黑沙陶片極多，有一陶器殘底，鑿七孔，類古陶甑」。「在河邊時拾銅鏡碎片，及陶片」，與上述柳堤距約四十餘里。^⑤ 這些居址、渠、堤遺跡，漢式風格陶器，顯示了漢地炊煮文化的陶甑、漢鏡、漆器、麻履等物，顯爲漢族居民集聚處。（圖三）

(四) 多種多量漢文物

在一九三〇年、一九三四年黃氏兩次調查土垠及傍近居住遺存中，共採獲有西漢紀年木簡 75 枚，漆、木器、絲麻織衣履、木竹器、骨、石、陶器等共 600 多件，以銅件爲最多，大概皆散布地表，隨手撿拾。其三棱形銅鏃、五銖錢，均作紫銅色，皆爲西漢遺物，在土垠地穴式房址附近，還曾拾到銅印一方，文曰「韓產私印」。另有鐵器、料珠、草具，以及玻璃等。^⑥



圖三：土垠附近屯戍遺址分布圖（引自黃文弼，《羅布淖爾攷古記》）

下午三時，使獵戶導之前往，向北偏東二十度行，四點，遭遇古道於堅剛鹽層間處，中顯白色泥痕，宛若轆〔轆〕轆，刮磨光平，顯爲往來人跡所遺。由西南向東北，蜿蜒屈行，或在山坡，或在平地。……道兩旁時有五銖錢，及零銅件，與瑪瑙之屬，必爲當時行人所遺。」「十五日，仍駐此地，……在大老壩北岸之土阜上，覓得古址一所。在一傾圮土坯中，顯出葦草。即發掘其下，出骨器五件，草具五件……復北行，又與古道會。沿道西偏南二十度行，在土阜之旁，五銖錢散布地表，俯拾即是。歸而數之，得六百餘枚。但無居住遺迹，其爲行人所遺無疑也。」

⑤ 同上書，頁 111。

⑥ 參《羅布淖爾攷古記》，頁 108。

二、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以來對土垠的考古調查

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以來，中國考古學者對羅布淖爾地區文物考古遺存進行了多次調查，少量發掘。在這些工作中，土垠遺址均受到關注。（圖四）只就筆者言，在土垠地區的調查、踏勘即達四次。相關踏查、路線，與黃文弼先生都不相同。概而言之，有三條：

其一，由庫爾勒出發，緣庫魯克山南麓、孔雀河北岸東行，與孔雀河北岸一線綿延的九座漢代烽火臺相依相伴，進抵營盤，復東行，達龍城雅丹。更穿越雅丹土丘林，覓見土垠。復由土垠入 LE（E90°07′03.25″、N40°38′41.28″）、樓蘭城。（圖五、六）

其二，係由阿爾金山腳下伊循故址——米蘭出發，北行，入樓蘭城，穿越已經乾涸的羅布淖爾湖盆，入土垠，再至龍城雅丹之中。湖盆雖已滴水俱無，但樓蘭城、土垠與羅布淖爾湖之相對位置，可以更清楚的具體把握。

其三，也是由米蘭入樓蘭、LE、土垠、龍城雅丹後，再由龍城雅丹東行，經白龍堆、庫木庫都克，過疏勒河尾間地段的甜水井，穿過庫魯克山與阿爾金山間緩平的峽口荒漠，抵甘肅西部三隴沙，入疏勒河谷、漢玉門關故址，進入敦煌。這幾次穿越，與當年黃文弼自吐魯番（車師故地）穿越庫魯克塔格山進入龍城、土垠的路線，完全不同，可互相補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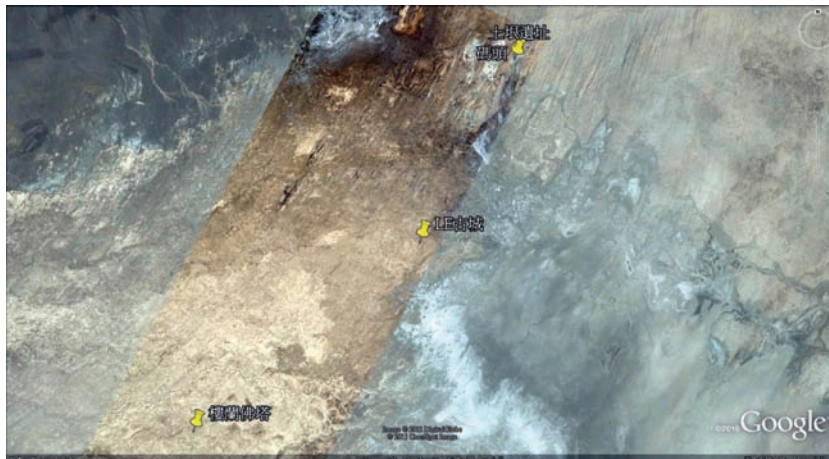
通過這些調查，不論從羅布淖爾地區地理、交通形勢的宏觀角度，還是遺址細部特徵，均取得重要收穫。

（一）從宏觀角度看「土垠」，有以下特點：

1. 它是距敦煌最近的可以提供淡水的地點，地處要衝。土垠是西漢戍邊將士們西出玉門後，可以取得淡水、草料補給的第一站。中原王朝戍邊健兒們由河西走廊西走，離敦煌，出玉門，沿疏勒河谷西行，過三隴沙，進入阿奇克谷地、白龍堆，除個別可以取得飲水的井泉外，幾乎都是缺水、少草的戈壁、荒漠。途程長達三百多公里。在以馬、駝爲運輸工具的形勢下，需經十天左右的跋涉，其困難、艱苦是難以盡說的。進抵羅布淖爾湖北岸龍城雅丹地帶，會正是極度困疲、乾渴之時。而這裡，是孔雀河尾間入羅布淖爾湖地段，可得到水質基本沒有鹽化、或鹽化甚弱的淡水補給。極度乾渴之下得見甜水，它的重要性，是怎麼估計也不過分的。



圖四：新疆土垠遺址（引自 Google Earth, 2011.06 搜尋）



圖五：樓蘭、土垠、LE古城相對位置（引自 Google Earth, 2011.06 搜尋）



圖六：樓蘭、土垠間之 LE 古城（引自 Google Earth, 2011.06 搜尋）

2. 土垠軍事地理形勢十分重要。「土垠」，實際居車師（吐魯番盆地）、樓蘭城（西漢時爲樓蘭國都，東漢、魏晉時爲西域長史府駐地）、西域都護府（輪臺境內）、營盤（墨山國都城）、伊循（米蘭）、扞泥（鄯善王國都城，今若羌）、敦煌這麼幾個重要軍事、政治中心之間，是它們交通往來的要隘（圖七）。尤其西漢時期，車師所在的吐魯番盆地，更東的伊吾（今哈密），均在匈奴控制之下，吐魯番盆地南緣庫魯克塔格山中有許多處山口可供騎兵出入。匈奴鐵騎，可由此十分便捷的南下羅布淖爾，阻斷漢王朝與塔里木盆地的聯絡。因此，漢王朝要安全交通西域，控制住樓蘭，扼守「土垠」，就是第一要務。守住了「土垠」，就有可能在孔雀河北岸移民屯田，就可以有效防阻匈奴征騎南下，保證西域都護府與敦煌間的交通安全。

3. 土垠所在半島，地勢低，東、西、南環水，北面爲龍城雅丹。所謂「雅丹」，是指叢叢列列的風蝕土丘林，綿延鋪展，達二～三公里。每道土丘均作東北—西南向，高可三～五公尺，最高可十多公尺，長數十公尺，攀越不易。雅丹土丘林與庫魯克塔格山之間是一片開闊、平展的山前沖積地帶，寬在十公里以上。這片地勢開闊、緩平的地面，除地表有小礫石外，土層頗厚。與孔雀河谷接連處，只要引水可及，可得農業墾種之便。黃文弼先生當年發現的西南、東北向古道，柳堤、灌渠、居住點，就在這片區域之內。作爲屯田之所，是並不困難的。（圖八）

（二）微觀考察土垠遺址，也有新的收穫：

1. 土垠遺址雖已遭受嚴重的自然、人爲破壞，但遺跡仍然清晰。顯示了相當周密的軍事防衛性質：遺址深處雅丹土丘掩覆之中。西側土牆加夯。南北爲陡坎，北部中間顯門闕。可收防禦之功。西部半地穴式建築，爲糧儲倉窖。絕無高臺、土塔類登高望遠，可以與烽火臺聯想的設施。而在土垠以西，近十處漢代烽火臺遺存，都是以高聳瞭墩爲第一特徵的。（圖九）
2. 遺址雖三面環水，但水勢有別。南、東兩面，無任何屏障，風大浪急之日，湖水勢必盛大。西側，實爲一處湖灣：相隔一百公尺左右，爲另一片土島。西風盛大時，可收屏障之功，在風起浪盛時，這片水域水勢會是相對平靜的。
3. 傍西側湖岸，在夯土圍牆外，可以見到一區南北向的土築臺基，相當整齊。南半段保存完好，北半段殘損。殘長三十、寬三、高〇·四公尺，以土塊疊就。這瀕水的土臺基，明顯爲水運碼頭遺址。與碼頭臺基相近，土牆圍垣外側，見到相當多量加固土岸木楔釘。木楔釘以胡楊爲料，釘長不足三十公分、直徑一～二公分，端部尖銳，深楔在土牆之中，其加固土堤，抗禦風、浪侵蝕的能力，不言可自明。地處湖灣，堤岸經加固。碼頭地近糧倉，清楚表明，糧運是當年重點關注的任務。（圖一〇）



圖七：居盧訾倉地理形勢圖



圖八：土垠遺址現狀

判定這一土臺爲漢代水運碼頭，還有另一旁證。在離湖岸約五十公尺處的湖灣中，據若羌縣文物保管所焦迎新介紹，他們在調查時曾採集到一束三稜形青銅鏃，總數近 60 枚。^⑦今天乾結的湖底，當年曾是水波盪漾。而且水勢不淺，所以不便打撈沉入之物。60 枚青銅鏃集中在一道，與箭鏃實際被使用、散落各處絕然不同，明顯是運輸中失落的情景。銅鏃遺落在湖盆中，只有一種可能：當年存在水運。軍備物質，曾經通過土垠碼頭運輸至瀕臨湖盆的其他軍事要地，如樓蘭、LE 古城等。這樣說，並不純爲邏輯推論。我曾認真觀察過相關遺跡：樓蘭古城中，自西北斜穿古城，由東南角出城，有一條古河道。這條小河出城後，與孔雀河支流相通，最後與羅布淖爾湖通聯，至今河谷痕跡清晰。這河道，自然可用作水運。自土垠至 LE 古城的車道，因穿越湖盆、平易好走，已成爲考察者來去的路線，形成轍跡。而線路，實際就是由土垠穿過湖盆後，進入一條小河道。小河道兩岸蘆葦側伏，痕跡依然。順這一河道行進，即可抵達 LE 古城邊。昔日河道、河床，成了今日的路面。土垠與樓蘭、LE 古城曾經藉水路來去，若可觸摸。

漢王朝曾經開拓羅布淖爾湖水運，是一個新觀點。這是與羅布淖爾地區雅丹密布的地理形勢，不時又有人員、糧餉運輸的緊迫需要密切相關的。改善這片地區交通，可肯定是漢通樓蘭時曾經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水運，大概正是呼應這一要求而產生的。

說雅丹起伏的羅布淖爾湖北岸，漢、晉時期的樓蘭，與四周交通困難，是史有明文、著錄在冊的。LE 古城，是一座城內只見一處建築遺存的軍事城堡，是樓蘭古城東北一座重要軍事防衛點。它們周圍，都是風蝕土丘林立。這種地理形勢，有助於它們的軍事防衛，但在交通上，對自敦煌至焉耆的絲路交通幹線而言（孔雀河北岸、庫魯克山前），卻是十分不便。在漢與匈奴的角逐中，樓蘭王國上下，深以「嚮導」、「負水擔糧」爲苦，一定程度上，就表現著這一交通艱難的形勢。一九七九年初，我們進入羅布淖爾地區，尋覓樓蘭古城遺址時，自庫魯克山前南入龍城雅丹之中，覓路抵達樓蘭，高低起伏，穿谷越坎，短短十八公里的直線距離，徒步前進，竟費十二小時以上，行進之艱難，超乎一般想像。這種交通不便，即使有馬、駝之助，也是無濟於事的。

面對陸上交通如是艱難形勢，會轉而開拓水運，這是情理中事。既有需要又有現實可能。西漢戍邊健兒行進至羅布淖爾湖北岸、覓路向樓蘭時，最後終於在湖北岸土垠上營建碼頭，發展水運，完成了一個重要的、成功的水運工程

^⑦ 二〇〇五年，爲探察玄奘東歸之路，焦迎新一道工作，在土垠遺址現場曾向考察隊具體介紹遺物出土情況。



圖九：「居廬訾倉」倉址



圖一〇：土垠碼頭遺跡

項目。緣何這一水運實況，竟未得進入史家的視野，沒有留下一星半點記錄，倒是留給我們的一個懸念。

4. 土垠遺存活動的年代，並不侷限在西漢（206 BC-AD 8），應遠較西漢爲長。二〇〇〇年，筆者考察土垠時，同行者中曾在土垠遺址東緣採集到一枚王莽時代的錢幣「大泉五十」。^⑧這直接說明了，終西漢之世遺址一直存在活動。揆諸形勢，及《魏略》等著錄中關於居廬訾倉的記錄（說明詳後），更可進一步推論，直至東晉階段，遺址曾一直作爲絲路幹線上的重要站點，繼續發揮著運輸的功能。因此，這些遺存、文物，尤其是水運碼頭遺跡，有相當重大的、不能輕忽的歷史價值。
5. 樓蘭遺址，曾是古代農業生產、屯田中心，這早已爲古城內外出土的多量漢、晉簡牘所直接證明。土垠遺址附近，也曾作爲屯地而存在過，是應予關注的新視點。古樓蘭城遺址內及其周圍地區，發現過相當多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中外考古學者在古城內外，採集到多量與農業生產有關的文物。青銅時代重要墓地古墓溝，去樓蘭也並不遠，清楚表明孔雀河流域，自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一直是羅布淖爾荒原上的農牧業生產中心。樓蘭王國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建設、發展起來的。

而土垠西北所見之古道、房址、柳堤，明顯具有漢代特徵的陶甃，也有不少早到青銅時代、晚至漢代的古塚等，^⑨又揭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事實：土垠附近，也曾作爲屯田基地而發揮過經濟補給功能。前引黃氏報告，是根據之一；根據之二，是筆者主持發掘了的孔雀河北岸老開屏漢墓。^⑩家族聚葬，錦絹保存仍然完好。死者的墓地，自然是與生者的聚落相去不遠的。只是風吹水蝕，居處又是十分簡陋的草木類建築物，多已湮沒無存。

樓蘭、土垠屯田，與土垠這一倉儲、水運遺址的出現、經營活動，直接關聯。

三、土垠爲「居廬訾倉」故址

自土垠發現迄今，已歷七十五年。但關於土垠遺址的性質、興廢、歷史地位等等，至今，考古界並沒有一致的認識。它的歷史文化內涵還有待充分揭發。

⑧ 採集者爲庫爾勒地區旅遊工作者吳仕廣，這一重要文物，後爲同行一學者收存。

⑨ 參見《羅布淖爾考古記·第二編 工作概況》，〈第二章 湖畔古塚〉，頁97-103。早期古塚與青銅時代古墓溝、小河墓地同，如L 5、L 11；晚期，具有漢代特徵，如L 5、L 11、L 12等。

⑩ 資料見吐爾遜·艾沙，〈羅布淖爾地區東漢墓發掘及初步研究〉，《新疆社會科學》1983.1：128-134。

黃文弼先生一九三〇年發現土垠，對其房址上部豎直斜陳的散亂木梁、遺址東北一束葦草把印象深刻，多角度申述，認爲與古代烽亭燃烽舉燧有關，判定這一遺址是絲路古道上的烽亭。¹¹這一結論，成爲黃先生的主導觀念後，一切均循此而展開，嚴重束縛了他進一步的研究視角。他一九三五年在《國學季刊》上刊〈釋居盧訾倉——羅布淖爾漢簡考釋之一〉一文，¹²首次刊布多件遺址內出土之居盧訾倉簡文、照片，遺址本身與漢居盧訾倉不可割裂的關係，幾乎已呼之欲出，但黃先生卻絲毫未作土垠即居盧訾倉故址之思考。

土垠遺址，從諸多方面斟酌，它不可能是古烽遺存，而應該就是西漢時期自敦煌至樓蘭古道上的重要站點——居盧訾倉所在。

考古界首先提出土垠不是烽燧，而是漢「居盧訾倉」故址這一結論的，是孟凡人教授。他在《樓蘭新史》中，據地勢、遺跡遺物，判定它不可能是古代烽燧，而係居盧訾倉。說它「是樓蘭道上的橋頭堡」，其時代「大致與西漢在鹽澤一帶開始列亭至西漢絕西域之時相當」。並進而推論，「當年，曾是西域都護府左部後曲候或後曲候的治所」，承擔著「倉儲」、「交通」的使命。¹³揭明土垠爲居盧訾倉，是孟文一大貢獻。但相關闡發仍有不足，故更作申述。

土垠絕不是一般之烽燧遺跡，而是兩漢時期自敦煌、玉門通西域大道上的位居關鍵的居盧訾倉，承擔著軍事、屯田、倉儲、交通、郵傳的多重使命。作此論斷，不僅得到遺址本身、出土文物的直接證明，而且可以與古文獻記錄相呼應。

土垠遺址中，先後出土了西漢時期的木簡 75 支。¹⁴其中，直接涉及居盧訾倉木簡有 4 支。文字逐錄如下：

「居盧訾倉以郵行」（簡 13）

「河平四年十一月庚戌朔辛酉，別守居盧訾倉，車師戍校……」（簡 15）

「交河曲倉守丞衡，移居盧訾倉。」（簡 16）

「元延五年二月甲辰朔己未，□□□土□尉，臨居盧訾倉以……己卯即日到守也」（簡 17）¹⁵

¹¹ 黃文弼，《羅布淖爾攷古記》，頁 105-107。

¹² 黃文弼，〈釋居盧訾倉——羅布淖爾漢簡考釋之一〉，《國學季刊》5.2（1935）：65-69。

¹³ 孟凡人，《樓蘭新史》（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頁 60-83。

¹⁴ 土垠出土木簡《羅布淖爾攷古記》刊布爲 71 支。一九九九年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牘整理小組用紅外線重新拍攝、釋讀相關木簡，有 4 支木簡上存文字，原報告未釋。故共出木簡應爲 75 支。

¹⁵ 相關簡文，據〈黃文弼羅布淖爾考古所獲漢代木簡〉釋文，收入初師賓主編，胡平生、陳松長校註，《中國簡牘集成》（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5），第 20 冊，頁 2324-2325。與《羅布淖爾攷古記》所刊簡文，個別文字有異。

這4支木簡，均涉及居廬訾倉。第13簡，文為「居廬訾倉以郵行」。「以郵行」，意為按郵行制度依次傳遞相關文書。如是，它的出土地，應是執行郵傳任務的郵舍，即「居廬訾倉」所在。

所以作這樣的判定，既注意到漢代郵行的規定，也吸收了漢代有關行政公文遞送制度的研究成果。近年出土張家山247號漢墓竹簡《二年律令》中有〈行書律〉。據此，可以清楚瞭解：漢代，文書上行、下達，有嚴格的制度。一般文書，只能「以次行」。不按規定，可「罰金四兩」。而文書較急，可以「以郵行」。如果「書不急，擅以郵行，罰金二兩」。「郵人行書，一日一夜行二百里」，誤期遲到，會罰錢。「書不當以郵行者，為送縣道，以次傳行之」等，¹⁶這些規定細則，可以幫助認識「以郵行」的相關含意。據此，「居廬訾倉以郵行」應是送達居廬訾倉的一組文書，封緘在一道，置於一個特定容器中，外面有一個醒目標籤。¹⁷這件木簡，特別寬、短，文字特別規整，字體很粗、又大又醒目，與普通木簡迥異。

（圖一一）是與作為一組郵件的標籤這一特別任務相一致的。此簡末端殘損，殘痕清晰。原為封檢當可肯定。同類性質的封檢，在居延也見過不少，如「甲渠候官以亭行」、「甲渠候官行者走」等。因此，發現「居廬訾倉以郵行」的簡文所在，可以確定無誤，只能是接受、處置相關文件的郵置地，即居廬訾倉。

第16簡「交河曲倉守丞衡，移居廬訾倉」。在不相統屬的平行官署之間行文，稱為「移」。交河曲倉之守丞名衡者，移文至居廬訾倉，這是既不相統屬，但彼此又地域相鄰，會有相關事務的兩處倉之間的來往文件。出土之處，按邏輯結論，自當在收文之地，也就是居廬訾倉守官的駐節之處。

第15簡、第17簡字跡比較漫漶，文字不完整，只是年、月、日明確，記錄了「別守居廬訾倉」、「尉臨居廬訾倉」，它們均與居廬訾倉的事務相關。據文意，相關木簡同樣是應該專送到居廬訾倉這一地點的。



圖一一：「居廬訾倉以郵行」木簡

¹⁶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170。

¹⁷ 這種傳遞方式，曾有學者進行過研究、復原。參見 Michael Loewe, *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Vol. 1.（中譯本為魯惟一著，于振波、車今花譯，《漢代行政記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上冊，頁46-52）。

如是，則可以結論，第 13 簡、第 15 至 17 簡，收文地點，應該就都在居盧訾倉。嚴重破壞了的遺址，只出土殘損嚴重的 75 支木簡，其中 4 支木簡，就可以清楚捕捉到與「居盧訾倉」的關係。因此，遺址是「居盧訾倉」故址，可以說是鐵案如山，不容置疑的。

遺址肯定爲「居盧訾倉」，它在漢代經營西域時，曾具有的特別重要地位，立即顯現出來。

《漢書·西域傳》〈烏孫〉傳記述，宣帝甘露元年（53 BC），因烏孫內亂，漢王朝曾經計畫「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鞬侯井以西，欲通渠轉穀，積居盧倉以討之」。¹⁸準備對烏孫動武，糧食先行。甘肅河西地區運糧，曾考慮「通渠轉穀，積居盧訾倉」，透露的重要信息之一，是漢代居盧訾倉，是可以水運聯絡的倉儲地點，這很值得關注，它與前面提到的居盧訾倉西側，傍湖而在水運碼頭遺跡，是可以聯想的資料。提示我們，應認真考慮漢晉時期羅布淖爾地區曾經存在過水路運輸的問題。

《魏略·西戎傳》記載：「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迴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¹⁹足見，自西漢到魏晉，在樓蘭仍然承擔著絲路樞紐站點的過程中，其間的「居盧倉」，一直是人們熟知的、自敦煌至樓蘭中間的重要站點。

這裡須要辨清一個問題：史籍中的「居盧倉」，與出土木簡上的「居盧訾倉」是什麼關係？黃文弼在〈釋居盧訾倉〉一文中，對此進行了分析。判定「居盧訾倉」與「居盧倉」實爲一地。前者爲當地土名，尾音爲「訾」，「班固作漢書取其典雅，故略去訾字尾音。魚豢亦從之未改」。²⁰不僅地名用字基本一致；而且在交通線路上的實際地位也一樣，因此，這一分析，深具說服力，可以信從。如是，則《漢書》、《魏略》中的「居盧倉」〔按：《魏略》「廬」作「盧」〕，與土垠出土漢簡中的「居盧訾倉」，爲同一地點。

將「居盧訾倉」遺址坐實在羅布淖爾湖北岸的土垠，則近代不少學者對「居盧倉」位置的考訂，必須進行辨正。這方面，如王國維的相關論述，他稱：《水經注》所述之龍城，故姜賴之墟。「居盧」、「姜賴」一聲之轉，即瑞典之斯文·赫定氏所發現

¹⁸ 《漢書·西域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 3907。

¹⁹ 曹魏·魚豢撰《魏略·西戎傳》早已亡佚，見晉·陳壽撰，劉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三〇，裴松之注引，頁 859。

²⁰ 黃文弼，〈釋居盧訾倉——羅布淖爾漢簡考釋之一〉。

之樓蘭。^{②①}說「居盧倉」在樓蘭，明顯錯誤。又如，黃文弼據《魏略·西戎傳》記述，認為「居盧訾倉應在涸海〔按：羅布淖爾湖〕之東南，即三沙〔按：三隴沙〕之北頭，與樓蘭爲東南與西北對峙，向西北行過涸海，方到樓蘭」。^{②②}將居盧訾倉放在三隴沙附近，顯然也是錯誤的。

判定居盧訾倉故址在土垠，對《魏略·西戎傳》中由玉門關進入樓蘭的線路記錄，進行分析，可以發現，這一段文字記錄也明顯存在舛錯。「從玉門關西去，發都護井，迴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居盧倉肯定在土垠，從土垠「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龍堆」，大家都可接受，意指羅布淖爾湖北岸、西北岸廣泛分布的風蝕土丘林——雅丹。穿過這片雅丹地，約三十多公里左右，^{②③}即可進入樓蘭故城之中，形勢、路線，可以說完全吻合。但如是行，「居盧倉」與「龍城」之間，就不可能再有「沙西井」的地位。由此可以判定：沙西井必不在居盧倉之西，而只能在居盧訾倉以東，《魏略·西戎傳》相關文字顯然存在舛錯。

這一矛盾，只從文獻出發，也早已有學者注意。黃文弼在其〈釋居盧訾倉〉一文中，曾有一段文字：「今據斯坦因亞洲腹地地圖所述：自玉門關西之拜什托胡拉克以西，沙磧迤邐，疑即魏略所稱之三隴沙。再西至庫木胡都克〔按：突厥語意爲沙井〕，疑即魏略之沙西井」。^{②④}只是黃氏深信土垠爲烽燧，而絕未將其與「居盧訾倉」故址相聯繫，所以不能在注意到沙井方位後，再進一步指出相關文字的舛錯。

新疆地理研究所的歷史地理學者黃文房，也曾注意及此。他在對羅布淖爾地區調查後，注意到羅布淖爾地區受自然地理制約，提出：「沙西井應在羊塔克庫都克的東部。『羊塔克』維語意爲駱駝刺，水質較好，長有駱駝刺，故名。」並介紹稱，這裡「水草豐茂，有泉出露……在泉水傍，我們沒有認真搜索就拾到幾枚唐代和清代的錢幣和一對釘有鐵掌的馬蹄。在泉水南面平坦的沙梁上有清晰的駝道」，「沿途有標示方向的堆石」，他認為沙西井所在「是南道與中道的分發點」，^{②⑤}即「羊塔克庫都克」。

結合地理實際，自羊塔克庫都克向西，南面是庫姆塔格沙山，北面是堅硬的龜裂鹽漠，道路只能在鹽漠以北的山麓地帶行進，只是在這裡才有些許水草可覓，駝馬可以通行。

^{②①} 王國維，〈流沙墜簡序〉，載《王國維遺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第二冊，頁247-248。

^{②②} 黃文弼，〈釋居盧訾倉——羅布淖爾漢簡考釋之一〉，頁67。

^{②③} 邢義田先生在審讀本文初稿時，曾藉細測樓蘭故城與土垠之間的距離，爲37.9公里，這是一個可以信從的結論，書此，也是對邢先生一絲不苟的學風，表示敬意。

^{②④} 黃文弼，〈釋居盧訾倉——羅布淖爾漢簡考釋之一〉，頁67。

^{②⑤} 黃文房，〈羅布泊地區古代絲綢之路的研究〉，收入夏訓誠主編，《羅布泊科學考察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87），頁306-314。

《魏略》中的「沙西井」，近代研究中，大都認為它在羅布淖爾以東，不論是今天的庫木庫都克，還是與其相近的「羊塔克庫都克」，都不出這個方位。

二〇〇五年，筆者在羅布淖爾地區考察，由樓蘭越湖盆，抵土垠。再從土垠穿越羅布淖爾湖盆北面、東北面的雅丹向東，經過白龍堆（一列列東北——西南向的巨大風蝕土丘，其上鹽漬，陽光下閃爍，銀光熠熠，顧名思義，稱之爲白龍堆。）過庫木庫都克（實際是一片寬闊的鹽漠地帶，稍見耐鹽的植被。一九八〇年，彭加木於羅布淖爾考察中，在這一片鹽漠中因尋找水源走失），更東行，途中有一處規模相當大的甜水井，林木蔥鬱，井水水面至少有十平方公尺左右。更東行，穿過庫魯克塔格山南緣開闊地帶，東行。庫魯克塔格山至此，已只是一片起伏的石丘，地勢坦平。由此十分方便進入三隴沙，又一片廣袤展開的雅丹土丘林，形勢壯觀。自此東行，沿疏勒河谷，進抵玉門關，入敦煌。（圖一二）結合這一實際考察體驗，再讀《魏略》之相關記錄，古代由敦煌進入西域，最便捷的路線，只能是穿越庫魯克塔格山與阿爾金山的前山地帶——庫姆塔格沙山之間的陷落盆地，這是地下水匯集處。不少地段有泉水出露，因地下水的補給，山麓地帶也有蘆葦、檉柳生長。這爲旅人提供了有限的草料、燃料。漢代的「絲路」，《魏略》記錄的通路，都只能在這一基本侷限之中。「都護井」、「沙西井」，都只能在這條路線上去尋覓，而絕無可能在土垠之西的龍城雅丹之中。



圖一二：龍城雅丹地貌

「沙西井」，不論在「羊塔克庫都克」，或者在「庫木庫都克」，都只能在居盧倉之東。如是，《魏略》的文字，最合理的可能是：「從玉門關西去，發都護井，迴三隴沙北頭，經沙西井，從居盧倉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如是行文，就與實際必須遵行的地理條件完全一致了！目前文獻上的錯誤，在於將「沙西井」與「居盧倉」顛倒了位置。這是著者魚豢或其後的抄錄者不諳實際地理、道路情況而出現的文字錯訛。在有過二十世紀的羅布淖爾地區地理大考察之後，是可以而且應該根據地理實際予以廓清、訂正的。

四、居盧訾倉附近曾存在屯田

「居盧訾倉」，顧名思義，當年它承擔的最根本任務是後勤供應。作爲「絲路」上的後勤供應基地，充分的糧食、草料、飲水，是第一需要。與之相匹配，往來使節、官員的住宿，馬、駝的替換，嚮導的提供……任何一項都不能缺少。

有學者認爲，居盧倉所在，不宜於農業，爲此所需糧秣，「似主要依靠伊循屯田。此外，渠犁屯田和車師屯田，可能也是糧食的供應者」。²⁶這一推論雖有邏輯上的可能，但揆諸實際地理形勢，是存在困難的。伊循、渠犁、車師屯地，到居盧訾倉，最短直線距離也得在二百公里以上，途中有山地、鹽漠，交通相當困難，這還不包括種種非自然條件，如戰爭等社會因素干擾，運輸之難是不言自明的。糧秣供應奠基於此，沒有安全、穩定的保證。

黃文弼第二次考察中，在土垠附近發現的柳堤、葦壩、房址、漢代居住遺址等文化遺存，是可以與漢族居民屯地相聯繫的要素。筆者認爲，當年所以選擇在土垠設居盧訾倉，很重要的一個理由就在於：這裡不僅地居衝要，有必要建設一處後勤基地；而且自然地理條件允許，完全有可能營造出一處後勤屯戍基地。西漢王朝使節、官員離開敦煌、疏勒河水系後，一直在少水少草的荒漠地帶行進，經過近三百公里的艱難跋涉後，人員、馬匹的困疲，對補充飲水、糧秣，獲得嚮導的要求是十分緊迫的。進入羅布淖爾湖北岸的土垠，在這裡第一次見到了淡水（羅布淖爾湖水鹽化程度相當高，不能飲用；但在孔雀河水進入羅布淖爾湖盆處，如土垠，卻是可以取得沒有鹽化的淡水的），不僅人、畜可以飲用，而且也可以進行農業澆灌，這是一。第二，在與孔雀河尾閘之北、至庫魯克塔格山之間，存在一片相當廣闊、平緩的土地，寬可有十多公里，綿長延展，基本與孔雀河平齊。這片土地地勢稍高，但卻是可以開墾、屯種的。自敦煌出發後，尋求水、糧補給的漢王朝使節、官員，在覓見土垠及傍近荒漠後，不思利用，是難以想像的。它是一片既可以建設成爲積糧畜草、住宿停息的基地，也有可以擇地進行屯墾的空間。雖然，目前在土垠遺址北部（它與遺址間有寬三公里多的雅丹相隔）的廣闊平野上，並沒有發現屯種、居住的痕跡（實際上，至今也並沒有考古工作者詳細的踏查）。地表，一般觀察，主要只是細沙礫。但其下，卻是深數十公分至一公尺以上厚的壤土，墾殖利用，並無困難的。

筆者判定在土垠遺址附近曾存在過屯田，主要根據有三：

一、這裡存在相當好的土地，且有通過屯種取得給養的緊迫需要。

²⁶ 孟凡人，《樓蘭新史》，頁81。

二、在土垠遺址內，出土了直接有關徙民屯田的木簡。

三、在土垠遺址以西，孔雀河北岸，黃文弼曾發現了居住遺址及提高水位，也可以說是與農業經營有關的柳堤。黃文弼當年即有柳堤旁「地勢平坦、可以種地。故築隄障水，使水東南流灌地」的結論。²⁷當然，這一與居盧訾倉故址相去不太遠的漢代聚落，可以是支持居盧訾倉糧食補給的較近一處屯墾遺址。行文至此，還有一件直接的文字資料，可以說明相關史實：這就是黃文弼當年在土垠所獲之第十九號木簡，具體文字是居盧訾倉主管官員的值勤記錄，文爲「……者王君旦東去。督使者從西方來，立發東去。君坐倉受糴。黃昏時，歸舍。」²⁸（圖一三）其中「君坐倉受糴，黃昏時，歸舍」文字，清楚表明，在居盧訾倉，是有可能糴得民間糧食的，因而，才有可能出現「坐倉受糴」的記錄。有糧食可資入糴，則附近必有生產糧食的田地。這也自然是土垠遺址附近，漢代確曾存在過農業墾殖基地的證明。否則，可供入倉的糴糧，是無緣得到的。

居盧訾倉所見 75 支木簡，不少殘缺，文字漫漶不清。這中間，明晰可見與屯戍有關的簡，至少有 8 支。其他部分木簡，存在文字很少，也可作這方面的聯想。從這一角度分析，與屯戍有關的，占出土木簡至少達十分之一，比例不小。具體如下：

簡 27 文爲：「□□里公乘史隆家屬畜產衣器物籍」

簡 29 文爲：「□□—霸陵西新里田由□□」

簡 30 文爲：「應募士長陵仁里大夫孫尚」

簡 31 文爲：「北□土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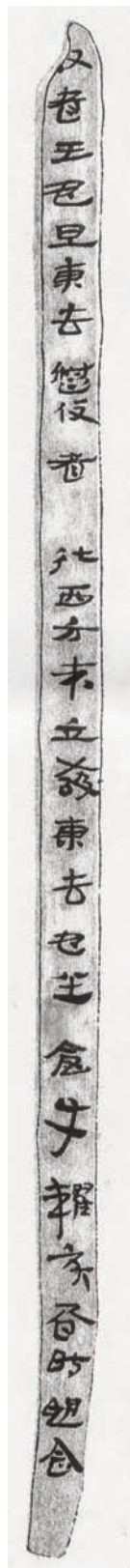
簡 32 文爲：「□□□小卷里王護□□□」

簡 34 文爲：「出南陽郡涅陽石里宋利親妻璣年卅私從者同縣籍同里交上□□□」

簡 40 文爲：「憚私從者大男□□六月乙丑盡 七月積一月十二日，食粟四石二斗」

簡 41 文爲：「□□□□□家屬六人，官駝二匹，食率匹二斗」

漢文帝時，鼂錯曾有募民屯戍以固邊防的奏章，說「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



圖一三：「坐倉受糴」木簡

²⁷ 黃文弼，《羅布淖爾攷古記》，頁 110-112。

²⁸ 此簡錄文引自《中國簡牘集成》第 20 冊，頁 2325。「君坐倉受糴」數字，黃文弼在其《西北史地論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頁 320）中，只錄「倉」字，釋「受」字爲「吏」。文意不明。

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臯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臯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²⁹ 漢代西域屯田的基本內容，大概都遵循著鼂錯的這一設計。土垠遺址出土的戍卒名籍，表明他們或來自京畿附近，也有來自河南南陽郡的，其中有「公乘」、「大夫」等高爵，不知是因爲自願戍邊而獲得的爵賞，還是原來就有的爵位。但這些細節，明顯可以看到，是鼂錯戍邊政策的具體實施。爲了安心、長期戍守，隨行人員包括了妻子、私從，還有畜產、衣、器物等財產，明顯是長居久住、「守邊備塞」的架勢。這些人進入土垠，很難設想只是單純的戍卒，而不從事農業屯墾，因爲只有那樣做，才能實現「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的目的。³⁰

有淡水，有可以耕種的土地，有屯戍之需要，而且居廬訾倉故址內確又見到與屯戍有關的簡文。據此，判定居廬訾倉附近，曾是又一處屯種的中心，是大概可以推定的。目前的工作，是需要進一步細緻、翔實的考古踏查，相關遺存或有望呈現。

五、屯戍移民的社會生活

「居廬訾倉」所在，曾有一區屯地。這屯戍基地，與「居廬訾倉」的關係，自然是十分密切的，「居廬訾倉」的正常運轉，必須有屯地農業生產的支持；其郵傳、軍事戍守任務，也自然會與屯地的戍卒們密切相關。這一屯地的管理情形，在「居廬訾倉」出土木簡中有無反應，是值得我們認真關注、搜求的。

居廬訾倉出土的木簡，只是兩次調查中的採集品。遺址，至今沒有經過科學概念上的發掘。這些木簡，相當部分記錄、保留下了倉吏當年的工作、生活，其中有一支記錄了倉吏接待來訪「三老」的情況。其文字如下：「庚戌。旦，出坐西傳。日出時三老來坐，食時歸舍」（簡 20）。這是居廬訾倉倉吏值勤的工作記錄。「旦」，清晨。日方出時謂之旦，倉吏已至傳舍值班。日出時（卯時，約當早晨六時左右）三老來坐。食時（辰時，約當早晨八時左右），歸舍。這是清晨有「三老」來訪的具體記錄。三老可以在清晨到訪，住地必不會遠。這清楚說明，居廬訾倉傍近，確有一實施著漢王朝基層行政管理制度的聚落存在。這一聚落，必爲漢王朝屯戍的移民，因爲只有他們，才會採取與內地一樣的行政管理制度。當地的土著居民，行政管理均依其舊俗，不會有「三老」之制的。

²⁹ 《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四九，〈爰盎鼂錯傳〉，頁 2286。

³⁰ 同上書，頁 2288。

「三老」，是秦、漢時的鄉吏。《後漢書·明帝紀》「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注云：「三老、孝悌、力田，三者皆鄉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風化也。文帝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人之師也。其以戶口率置員。』」^{③①}三老，這是兩漢時期農村基層管理制度。鄉村小吏，自然不可能銜中央之命前來西域；他們，只能是來自與居盧訾倉相去不遠的屯地，是屯地基層官員。因處西域，遠離故土。而居地相鄰，密切，屯地每年上交的糧食，都會入於居盧訾倉中，以供時需。因此，倉守與屯地三老，彼此會是諳熟、而且時相過從的。也正因如此，所以簡文中只說「三老」，而不說姓名。這支簡文，透露的最重要文化信息是：一、與上引多件戍卒、私從、家屬名籍相呼應，清楚表明居盧訾倉附近，確實有屯田。這些屯地，保證了當年的各類交通供應；二、屯地戍卒，來自中原。進入西域後，其基層組織，一仍其舊，行三老之制，與中原大地並沒有差異。作爲一個新的移民點，他們把老家一切都帶到了西域。嚴密的組織，平時力農，教育學習，孝悌父母，有敵來侵，可以守禦應戰，這就使居盧訾倉一線，成爲了不僅可以來去、而且可以取得充分給養、安全無慮的休息地點。不從這一角度去理解，「日出時，三老來坐」的簡文記錄，就會成爲一個無法理解的謎團了。

這些來自中原大地的戍邊者，田作、日常生活秩序，大概是與故土無異的。對此，文獻不見記錄，考古資料也不能提供準確的說明。同出的木簡中，有《論語》、司法文書殘文。《論語》殘文爲「□□亦欲毋加諸人。子曰：賜、非」（簡 59）十字。當爲〈公冶長〉篇中：「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一句之殘文。表明《論語》類的儒家經典，在邊防駐軍及屯戍基地中，也都是文化思想灌輸的主要內容。除這類儒家經典外，還有就是實際社會生活中，關係至爲密切的刑法類規定，如簡 60，文爲「□□及劍賊（？）殺死以律令從事」，^{③②}即明顯是與刑法相關的律令文字。此外，還有一些疑爲古籍之斷簡，只是殘缺過甚，已難知其所出了。

生活用品，從居盧訾倉出土文物看，有陶器、甗、漆杯、銅鏃、錢幣、梳、各色履底、襦、褲、布袋、毛布、殘氈、羅紗、麻紙、絨線帽、簪、櫛、耳飾、銅鏡等，實際表現著當年西域戍邊健兒們的生活情況，與河西地區戍卒及中原大地農民的生活情況，是並無大差異的。

^{③①} 《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二，頁 96-97。

^{③②} 此簡文字，諸家釋文不一。此從《中國簡牘集成》第 20 冊，頁 2340。

六、土垠是「倉」也是「郵」，具交通樞紐地位

土垠，不僅是漢代重要倉儲，而且是西域道上的重要郵置，具有交通樞紐地位。

西漢時通西域，因政治、軍事形勢，重點只能擇羅布淖爾地區樓蘭一道。擇在羅布淖爾湖北岸土垠，建設「居廬訾倉」，是保障樓蘭通道安全的重要舉措：它深處龍城雅丹之中，地勢隱秘，卻控扼著東西、南北交通之咽喉，匈奴游騎自伊吾、車師進入樓蘭，均在其偵伺、控制之下。在此駐軍，可有效抗阻匈奴遊騎的侵擾。徙卒屯田，不擾樓蘭，保證供給，這就爲西域大地來去中原，建設起了一處重要的補給站。使節、商旅往來，居住、休息、供給無慮。在樓蘭王國北境，構建了這麼一處軍事補給基地，可以保證樓蘭北境的安全。通過居廬訾倉，漢王朝與樓蘭的聯繫，既有穿龍城而走的陸路，又有自湖上方便抵達 LE 古城、樓蘭古城的水路，它的意義是十分重大的。

居廬訾倉既然具有如是重要交通地位，自然也成爲了一處重要的郵置基地。出土簡文中「居廬訾倉以郵行」（簡 13）十分清楚揭明它是承擔著「郵置」的使命。「都護軍侯張良所假官驛牡馬一匹，齒八歲，高五尺八寸」（簡 1）、「交河曲倉守丞衡，移居廬訾倉」（簡 16）等，也都是通過郵置「移」文、用馬，是記錄郵置運行情況的文字。

居廬訾倉在絲路交通上的重要地位，使節、官員往來不絕於途的景象，出土木簡也可見一斑：

簡 1：「都護軍侯張良所假官驛牡馬一匹，齒八歲，高五尺八寸」

簡 2：「永光五年七月癸卯朔壬子，左部左曲候□□」

簡 4：「二月庚辰朔丙午，後曲候□□□」

簡 5：「□□者馬君，左部後曲候尊、丞商、令史利□□」

簡 6：「□□部右曲候□□令史□□□□□」

簡 7：「□□部軍守司馬□□□」

簡 8：「君使宣告左右部司馬衍□□□」

簡 10：「伊循都尉左□□」

簡 11：「伊循卒史箕廣宗，二□□」

簡 12：「龜茲王使者二□□」

簡 18：「乙巳。晨時，都吏葛卿從西方來，出謁，已，歸舍。旦，葛卿去，出送，已，坐倉校錢。食時，歸舍。日下鋪時，軍侯到，出謁，已，歸舍。」

簡 19：「……者王君旦東去。督使者從西方來，立發東去。君坐倉受糴。黃昏時，歸舍。」

簡 21：「□□行馬。已，坐西傳中。已，出之橫門視車。已，行城戶。已，復行車。已，坐橫門外。須臾，歸舍。」³³

西域都護府駐節在烏壘城，其下屬官有軍候、左部後曲候、右部後曲候，駐守在阿爾金山腳下的伊循都尉、伊循卒史，位於天山南麓庫車河畔龜茲王國的使者，東來西走的督使等，都以這裡爲進出中原的住宿、中轉處，送往迎來的事情是十分不少的。以第 18、19、20 簡十分生動的記錄了居盧訾倉守官日常迎送、接待工作，公務忙迫。這幾支簡文，雖並不足以表明當年絲路上東來西往的全部景況；但也多少表明了當年絲路上匆匆來去的官員、使節，數量確實是不少的。龜茲王使、西域都護府屬官，是循天山南麓絲路北道前來的客人；伊循都尉、伊循卒史是來自阿爾金山腳下的屯戍重地伊循（今米蘭），是絲路南道上的重鎮，南、北道的使節、官員，都通過這裡進入河西走廊，居盧訾倉所具交通樞紐地位，清晰可見。

七、居盧訾倉之興廢年代

居盧訾倉的興廢年代，歷史考古界觀點不一。黃文弼據遺址中相關簡文，推定西元前一世紀中葉是故址的使用階段，這自然沒有問題。孟凡人在《樓蘭新史》中推定，該遺址當與西漢王朝開拓西域的事業密切相關，起始在西漢王朝開拓西域、羅布淖爾建列亭之時；而直到西漢王朝末年，這一倉、郵建制，仍在運行之中。³⁴ 這一分析，相當合理。出土簡文，雖只是這一時段中的一個小階段，也屬情理中事：出土遺物與遺址的全局、全貌比，畢竟只能是其中的局部、一角，不可能要求遺物表現遺存的全局。二〇〇〇年三月底四月初，我在土垠考察期間，同行的吳仕廣，曾經在土垠遺址東側湖岸荒灘中，採集到王莽時的貨幣「大泉五十」，這雖只是一枚普通錢幣，卻十分清楚地揭示：土垠遺址直到西漢末的新莽時期，仍在活動之中。如果聯繫到《魏略》中提到的：自敦煌通達樓蘭的路線，又表明自漢代起迄魏晉時止，居盧訾倉，仍繼續承擔著重要的交通使命，是居於交通樞紐的地位。如果這樣，作爲居盧訾倉故址的土垠，不僅應該保留著西漢時的文物，而且晚到東漢魏晉階段的文物，在這區古址上也應有所見。目前所見木簡，從書體觀察，主體是西漢風格的隸體，雖個別簡文，時代明顯較晚，但總體分析，目前所見出土文物，顯然不會晚到魏晉，與上述邏輯推論存在難以統一的矛盾。對這一現象，應如何理解，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一種可能是：相關晚期文物應處於遺存之上層，在黃文弼調查這區遺址時，上層文化遺存，尤其是簡牘類文書，多已在凜冽的東北季風中消失難覓，少量日用器皿，如陶、織物、藤類，有可能晚到東漢以後，但我們並未能具體辨析清楚；再一個因素，

³³ 諸簡錄文，均見〈黃文弼羅布淖爾考古所獲漢代木簡〉釋文，《中國簡牘集成》第 20 冊，頁 2323-2326。

³⁴ 孟凡人，《樓蘭新史》，頁 62-65。

對這區遺址，除了黃文弼先生當年比較簡單的兩次調查外，並未進行深入一點的工作，也沒有擴大調查範圍，更沒有對相關遺存，組織一定規模的科學發掘。如果展開相關工作，或有可能對居盧訾倉及其傍近相關遺存的興廢年代提供更為全面的資料，對遺址中積澱的社會文化生活，也有望獲得更為豐富的資訊。

八、再議「居盧訾倉」水運

在古代西域地區的交通中，只見駝、馬，從未見到有過水運的文獻記錄。但土垠古址西側傍水的土碼頭，又明顯揭示著：在古代羅布淖爾地區，交通聯絡中，曾存在水運，這一點，無可置疑。這可補文獻的缺失，也提出了一些須待深入的問題。

絲路中道出河西走廊自疏勒河谷向西，過阿奇克谷地，尤其是進入白龍堆、龍城雅丹後，風蝕土丘叢集，交通艱難。西漢以後，為開拓通向西方世界的交通，漢王朝在樓蘭、車師、輪臺等地，經武揚威，不稍息停。遠征軍伍，不患戰而患饑，軍事後勤補給是頭等大事。西元前一世紀中葉，設立西域都護府，使節、商旅往來，郵置供應，糧秣草料，不可稍缺。屯田，可解決糧、草生產；戈壁沙漠、雅丹地帶的運輸，仍是相當難以克服的困難。因應這一社會需要，西漢王朝的戍邊將士在進入龍城地區後，面對危難，曾因地制宜，利用羅布淖爾湖、孔雀河，開拓、發展過水運事業。糧食、軍資，曾是水運的主要內容。羅布淖爾湖北岸居盧訾倉故址，水運碼頭保留至今，基本完好。居盧訾倉，不居陸路要衝，而傍湖建設，是因應水運需要而設置的一處倉儲。考古遺址為此提供了實證，也為我們開展進一步研究拓展了思路。

在羅布淖爾，西域交通中既存在過水運，卻絕不見諸古代文獻。這一矛盾，如何解析，是一個應予探討的問題。我推論，這可能與水運只是侷限在這一小地區，是西漢在樓蘭的戍邊將士們因應本地情況而開拓的事業，使用時間不是很長，規模也不是很大，未關涉全局，因而並未引起當年朝野上下關注，未能見諸相關文獻記錄。

羅布淖爾存在水運，從交通地理環境角度分析，是既有必要也存在可能的。

在孔雀河下游發掘的古墓溝墓地，是去今三千八百年前的青銅時代遺存。在這片墓地內，曾出土過「一小塊殘破網罟」。⁹⁵這一小塊網罟，混雜在墓葬上部覆土、皮張中，當不是作為生產工具，而是有意識隨殉的文物。但網罟的存在說明：在迄今三千八百多年前，在孔雀河流域，古代先民能夠網捕魚類，以補充生活資源的不足。既會

⁹⁵ 王炳華，〈孔雀河古墓溝發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社會科學》1983.1：117-118, 130。這一網罟圖形象，見筆者著，《滄桑樓蘭——羅布淖爾考古大發現》（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2），頁95。

捕魚，就可能存在簡單の木船。在二十世紀三〇年代以前，在塔里木河、孔雀河、羅布淖爾湖、喀拉庫順湖中，有獨木舟來去，也有捕魚業存在。（圖一四）說明在這片地區，歷史上曾有過原始的水運；只是它沒能得到充分的發展。（圖一五）



圖一四：羅布泊岸邊，半埋在土中的獨木舟（引自夏訓誠主編，《中國羅布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風蝕土丘密佈在羅布淖爾湖東、北、西邊，成爲了交通樓蘭綠洲時難以逾越的天然阻障。樓蘭，居於孔雀河下游三角洲地帶。這裡河網密布，適宜農、牧。是青銅時代迄至漢晉時期羅布淖爾荒原上的政治、經濟中心。而且，位置最近敦煌。西漢王朝時開拓西域，首先必須進入樓蘭。而與樓蘭交通往來，穿越其北部的雅丹土丘林，是十分艱難的旅程。這是西漢王朝時，與樓蘭發生過實際聯繫的任何人都會銘刻在心的一個印象；第二個強烈印象，會是長途荒漠跋涉後，波平如鏡、水域不深的羅布淖爾湖面。這遼闊的湖水，對騎馬民族，是難以逾越的困難，對處身西域、北方中國，不習水性、不諳水運的居民，同樣是認識不到、駕馭不了，因而也不會想到開發、利用的水資源。但這水波不興的湖面，放在諳熟水性，水路運輸是日常生活一環的江南水鄉居民的面前，簡直就會是可以暢行無阻的坦途。

作一個邏輯推論：西漢王朝的戍邊將士們，來到羅布淖爾湖北岸，面對龍城雅丹的扼阻；反觀，羅布淖爾湖寬闊的水面，尤其看到了樓蘭土著居民們在孔雀河上往來的獨木舟，會決定利用羅布淖爾湖水域進行水運，以避開龍城雅丹地勢帶來的交通困難，這是無庸置疑的。

西漢王朝將居盧訾倉，設置在背靠雅丹、面對羅布淖爾湖的土垠上，這一選擇本身，十分清楚表明了要利用這一水域的意圖。



圖一五：一九五九年，中國科學院科考隊蕩舟羅布淖爾湖

西元前一世紀，活動在西域大地上的西漢王朝的官員、吏士，其祖籍不止於北部中國，來自江南水鄉的吏員也是不少的。漢武帝元封年間（110-105 BC）武帝以江都王劉建之女細君爲公主，遠嫁烏孫。不幾年後的太初年間（104-101 BC）細君過世，又以楚王劉戊之孫女解憂爲公主，再嫁烏孫。劉戊的封地，在今長江北岸的揚州，細君、解憂都是來自長江下游河網密佈的水鄉，他們的隨從，自然也多出自南方。據《漢書·西域傳》，細君遠嫁烏孫時，西漢王朝曾「爲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解憂遠嫁，規格不會低於細君。這龐大的隨從隊伍中，不少會是細君、解憂身邊的南方親隨。這些人，自然是瞭解水性的。丟開這些遠去烏孫的使團成員不說，在遠戍西域的江南吏士中，最後成就大功業者中，還有來自長江三角洲的第一任西域都護鄭吉：祖籍會稽，年輕時以「卒伍」從軍，曾數出西域，屢有建樹，終由卒伍升遷爲「郎」官。在西元前六八年，擔任西域最高行政長官西域都護前，他曾經率領士卒在羅布淖爾荒原西部的渠犂屯田；渠犂，是緊鄰羅布淖爾荒原的一塊綠洲。其後，他又曾在羅布淖爾北部的交河屯田。西元前六二年，漢宣帝時因功封爲衛司馬、護鄯善以西南道使者。「衛司馬」是一個軍職；「護鄯善以西南道使者」，顧名思義，其工作職責在負責傍阿爾金山、昆侖山北麓西行的絲路南道的管理事務。由敦煌西行，進入阿爾金山北麓的鄯善，可以在羅布淖爾荒原東部羊塔克庫都克斜向西南行，也可以先到樓蘭，復由樓蘭進入伊循。樓蘭是漢王朝著力控制的重要經濟、交通中心。由此折向南行，抵阿爾金山腳下，相當便捷。這一任命，清楚表明了鄭吉在任西域都護前，曾經肩負過經營、管理羅布淖爾地區交通的重任。《漢書·西域傳》中稱鄭吉「爲人彊執，習外國事」。他由基層的「卒伍」，最後得爲首任西域都護，是與他在羅布淖爾荒原及傍近地區艱苦戍邊所建功業密切相關聯的。鄭吉故鄉所在的古越地區，向長水運。戰國時期，越國即曾以水軍沿海北上進攻齊國，表明水運在古代越國是十分平常的。鄭吉出身越地會稽，自小貧困，且爲人強力、勇毅、百折不回。他在羅布淖爾地區活動時，會注意到這裡的地理環境，開拓或推進相關水運事業，是一點也不會令人費解的。雖然這一推論，目前還只是邏輯的推理，是一個假說，但它存在的合理性，是不能輕估、而且必須予以重視的。

古代文獻記錄浩如煙海。但是，根據零散出土的考古資料，驗之相關文獻記錄，那浩如煙海的文獻，比較起曾經展開過的歷史生活實際，真也不過是九牛一毛。日常生產、生活，特別是普通的、基層的、民間的生活，大多是無緣、無法進入統治上層文人們的視野，進而流瀉入他們的筆端，成爲我們今天可據以認識古代歷史之文獻的。從這一角度說，這類有幸保存的點滴史跡，自然更爲珍貴，值得重視，認真探究，發掘其背後蘊含的歷史文化信息，以求逐步走向古代歷史文化的真實。

二〇〇五年初稿，二〇〇九年校改，二〇一〇年再改。

【附錄】

《羅布淖爾攷古記》中關於土垠遺址的記載

漢烽燧亭遺址，即在土垠（音艮）平灘上。（第一次、第二次路線圖 L ㄅ）北距得格爾約三百五十里，位於經度九〇，北緯四十五度十分，（此據同團陳宗器君所測）傍於海岸之三角洲，三面環水，惟北路通陸，形同肺葉。而此址即在其末端。四周土阜駢峙，如島嶼，如城郭。行人由西至東，或由東至西，至此城時，必須沿湖環行，越過土阜數重，方達到此址，蓋已至湖泊之中洲矣。遙望海中土阜重疊，迤邐若斷若續，似無數戰艦，爲避風濤之襲擊而停泊於海隅者。風起沙飛，類同烟霧，白鶴翱翔於天空，魚鳧遊戲於水上，洵爲海中奇觀。此處爲孔雀河末流所匯，故爲淡水。水極清澈，可飲可濯。過此皆爲鹹水，旅行家之來往東西者，咸憩息於此，爲通過艱險長途作準備也。此地適當漢通西域北道之衝，凡出入玉門關而至西域者，必須經此。以今揆古，其情實同。故當時在此設烽燧亭以護行人，乃必然之勢也。

當余於四月二十五日之至遺址也，已近黃昏，不及視察。次晨興起，尚未及盥洗，而余僕人汗木多利、毛拉等，即以所拾古物至，銅矢鏃，銅錢，各盈一握。余甚喜，即往檢視遺址。在余帳棚之西，有城牆遺址一段，高二尺許，餘三面均被衝刷。在南有長方形土台，高八英尺許，長十九英尺。寬五英尺五寸。上豎立木竿五，南北直列，高十二英尺弱。每竿相距約十二英尺許。木竿上端鑿一方孔，疑爲穿桔槔之用。尚有若干廢棄木料橫陳其旁，木上均有斧鑿痕迹，或中鑿圓孔，或方木而中鑿一槽，均長不及丈，疑皆爲支持烽竿之用，類今之取水井架也。在竿之四週，尚有許多四方井穴，用柳條蓼以木屑，編織爲襜，覆於井口，約四尺建〔見〕方，彼此相通爲甬道。就其構造方面言，顯然爲古時烽火台遺迹。《漢書·賈誼傳注》云：「邊方備胡寇作高櫓，櫓上作桔槔，頭懸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按所謂櫓，疑即木竿。桔槔即竿頭所懸者，桔槔失，而竿頭之方孔尙存耳。又《墨子·號令篇》云：「望見寇，舉一垂，入境舉二垂，狎郭舉三垂，入郭舉四垂，狎城舉五垂。」按垂爲附竿之橫木，每有一竿，必有一垂，此處木竿五，即所謂五垂也。舉垂必有兵卒，疑竿穴旁之井穴，皆兵卒避藏之地，如敵人來侵，避匿其中，免受敵人之攻擊也。余在竿之兩旁，曾掘二井，內滿儲沙子，無一他物。余於民國二十三年第二次前往時，復掘其旁之其他井穴，有類似高粱之穀粒，已腐化結爲乾餅，或井中兼儲食糧，亦未可知也。在台上南北部，各有房址一座。北房現已傾圮，牆基尙存，高四尺許，重疊不規則之土塊與鹹塊爲牆。土塊長約十五吋，寬約八吋，厚四吋，略作長方形，間以葦

草。鹹塊長約十六吋，寬約十吋不等，形狀極不規則，蓋隨意取諸鹹灘中也。南房上覆以柳條與木屑編成之屋頂，頂已〔已〕傾塌，內滿儲沙子。余曾清理其遺址，拾殘斷木簡一枚，現存「從事人姓名」等字。北面之房亦存牆基，上無覆頂，中無何物。又台之南北兩端，略作斜坡形，疑爲房址。掘其南端，至與台齊，悉沙灰土，別無他物，或因台土下傾所致也。在烽火台之東約百餘步，有古房址一所。在一寬廣平灘上，周里許，略作橢圓形。地爲硝鹵。在灘南枯木橫陳，類似古時建築遺構。東邊似有牆壁遺迹，西邊已被風水剝蝕，而作溝渠狀矣。在此平灘之北，略與烽火台北端東西對值，有圍牆遺址。疊鹹塊爲牆，旁集葦草，長丈餘，高五六尺，形成弧狀。中積沙成阜，高與牆齊。余發掘其下，出漢木簡數十枚。墨書隸字，完整者，長八寸，寬三分，殘整不一。一簡有「黃龍元年」字樣。黃龍爲漢宣帝年號，距今以一千九百六十餘年矣。又有「左部後曲候」「右部後曲候」等簡，疑此地爲「左部曲候」所在地也。又在此葦草中，發現漆栝一件，橢圓形，長三寸五分，寬二十八分，高一寸。內爲朱漆，外塗黑漆，裏劃幾何花紋。又有木匣漆木幹之類，西漢之漆器，由此可見一般。尤能使余滿意者，即在葦草堆集中，發現古代之炬，長三尺許，以葦草束之。炬《說文》本字做苴，束葦燒也。蓋見寇則燔炬爲號，每舉一垂，即燔炬一通，以燔炬之多少，示敵人之遠近也。唐《兵部烽式》云：「寇賊不滿五百放烽一炬，得蕃界事宜，知欲南入放二炬，蕃賊五百騎以上，放三炬，千人放四炬，餘寇萬人亦四炬。」（白氏《六帖》引）此以燔苴之多少，示敵人之多寡，與《墨子·號令篇》所述微別。要之此束葦燔燧之炬，則無可疑也。又在烽燧亭之北，約數十步，有土阜一所。阜之傾斜處，葦草外露，似爲古房遺址。余命小候掘之，上層浮沙土，中層灰土，下層乾沙土。木簡皆在中下兩層。在中層出「元延五年」木簡一枚，元延爲漢成帝年號，已至西漢之末期，而亦爲余所獲木簡中最後之年代也。乾沙倚阜處，岩壁屹立，中留灰土痕一線。知古時鑿阜爲牆壁，倚岩構屋而居。此處除發現木簡數枚外，餘無他物。由此而東，直抵海岸，地面因水衝刷，土阜鱗次櫛比，在其不平齊之地面上，似有鑿壁構屋遺迹，但大半已被風水剝刷淨盡。除高岸處漸露修鑿遺痕外，餘已淹滅無迹矣。余第二次復赴羅布淖爾考察，在五月九日，到達余第一次所發現之古烽燧亭遺址。除採拾木簡十數支外，又在烽燧台之南北兩端，在高低不平之地面上發現東西相承之鑿痕一線。其鑿削處以在 C 處之土阜旁，最爲顯著。余在此掘拾《論語》殘簡一枚。